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逻辑冲突 及其协同治理路径

——基于双重理性张力的视角

黄 振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教学部,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日

摘 要

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核心载体, 当前面临治理结构虚化、利益机制不彰、评价准则错位及育人价值边缘化等现实困境。基于制度逻辑理论, 本文在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理性”主线的基础上, 引入逻辑多元性、逻辑混合性与权力关系分析, 揭示市场、国家、专业与社群等逻辑在市域场域中的交互作用, 进而说明目标导向异质、时间维度非对称、议程设置失衡及组织认同偏差是制约运行效能的核心症结。在此基础上提出, 通过比较不同实体化治理形式、构建利益补偿公式与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并辅以数字平台支撑和风险边界约束, 推动工具效能与育人本质在制度层面的耦合共生, 为优化区域产教融合生态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

市域产教联合体, 制度逻辑,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协同治理

Institutional Logic Conflicts and Pathways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A Perspective on Tensions between Dual Rationalities

Zhen Huang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February 25, 2026; accepted: March 24, 2026; published: April 2, 2026

Abstract

As a key institutional vehicle for advanc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face persist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hollow governance structures, weak incentive and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misaligne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Draw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se challenges in relation to instrumental and value rationalities, while incorporating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logic hybridity, and power relations into the analysis. It shows how market, state,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 logics interact within the municipal field and argues that divergent goal orientations, asymmetric temporal horizons, agenda-setting imbalances, and misalign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ies are the principal constraints on consortium effectiveness. In response, the study proposes an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hat compares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governance, develops a formula-based benefit-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pport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and clearly defined risk-governance boundaries. By promoting closer alignment between instrumental efficiency and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cosystems.

Keywords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Institutional Logic,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其核心目标在于将产教融合的场域从微观的校企合作转向中观的区域治理。在政策推进与地方实践过程中,产教联合体面临着产业发展的效率诉求与教育本质的育人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此类矛盾致使实践中出现了合作形式化、育人功能边缘化以及治理主体协同不畅等问题。从组织属性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既需满足产业链对技术技能的需求,亦应承载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如何平衡工具属性与价值属性的关系,已成为制约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定位。技术功能视角的观点认为,联合体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达成专业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匹配。而教育本质视角的研究则主张回归育人为本,强调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支撑作用。虽然既有研究触及了不同逻辑之间的差异,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在工具性或价值性之间进行单一取舍,未能充分揭示市场、国家、专业、社群等多重制度逻辑在同一场域中的交互与混合形态;另一方面,现有分析较少关注不同主体因资源禀赋、行政地位与标准制定权差异而形成的权力不均衡,因而难以解释联合体为何在议程设置、制度安排与利益分配上频繁出现失衡。面对产教融合中存在的利益博弈与功能错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冲突根源。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制度逻辑视角切入,以双重理性为分析主线,并将其置于市场、国家、专业与社群逻辑共存的制度复杂性之中,进一步分析不同主体的权力位置如何塑造联合体的冲突表现与治理后

果。通过剖析双重理性背后的多重逻辑关系及其在市域治理环境中的动态耦合, 本文旨在为地方产教治理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 并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促成产业效能与育人价值的协同增长。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产教联合体的基本属性, 也为完善区域产教融合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

2. 市域产教联合体双重理性的逻辑内涵

制度逻辑理论为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本质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弗里德兰德最早提出了制度逻辑的概念, 认为社会系统由市场、国家、专业、家庭等多个具有差异化逻辑的制度领域构成, 每个领域都拥有独特的行动准则、价值序列与符号体系[2]。桑顿与奥卡西奥则进一步完善了上述理论, 强调制度逻辑是指导组织及其成员日常实践的物质实践与符号载体[3]。进一步看, 市场、国家、专业与社群等制度领域并非以彼此隔绝的方式发挥作用, 而是经常在同一组织场域中形成多元并存、相互嵌合的制度复杂性。在该视角下, 市域产教联合体不仅是行政指令的产物, 更是多种异质性逻辑在特定场域内博弈、混合与再生产的过程。本文延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理性分析框架, 但将其理解为对多重制度逻辑的抽象归纳: 前者主要对应市场逻辑及部分国家绩效逻辑, 后者则更多承载专业逻辑、公共逻辑与社群逻辑的规范性要求。联合体运行的复杂性不在于两个抽象概念的静态对立, 而在于多种逻辑以不同强度进入同一治理场景, 并在资源投入、规则设计与身份认同上形成混合效应。通过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多维内涵解析, 可以揭示联合体作为一种现代制度形式的内在逻辑结构[4]。

2.1. 工具理性: 基于产业效能的功能整合逻辑

工具理性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占据了实践维度的优先位置。此类逻辑深度植根于技术功能主义的传统, 将职业教育视为区域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要素。在市域范围内, 工具理性的核心在于追求效率与适配。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升级, 区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表现出极强的时效性与精准性。联合体作为一种制度响应, 其首要任务是依托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的重新组合, 降低校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5]。在该逻辑支配下, 专业群的设置必须紧扣产业链的脉动, 人才培养方案需由企业需求倒逼而成。甚至实训基地的建设也需遵循投入产出比的经济原则。工具理性赋予了联合体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使其能够迅速聚合市域内的优势产业和教育资源, 形成服务于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协同效能。从更深层次看, 工具理性的运行依赖于一种契约式的交换逻辑。企业凭借提供实训岗位、技术设备与行业标准来获取人力资源保障, 而院校则通过输出精准培养的劳动力来证明自身的社会服务价值。这种基于利己动机的理性选择, 构成了联合体运行的初始动力。

2.2. 价值理性: 基于育人使命的意义共生逻辑

然而, 过度向工具理性倾斜往往会诱发联合体陷入技术至上的单一评价体系, 进而忽视教育作为一种生命成长活动的本质意义。这便引出了价值理性这一关键维度。价值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应然状态的坚守, 它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伦理价值而非即时的功利结果。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提醒我们, 社会组织生命力不仅源于功能的实现, 更源于主体间通过诚实对话达成的共识[6]。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框架内, 价值理性的核心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正。职业教育不应被简化为简单的岗位培训, 而应致力于塑造具有健全人格、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劳动者。联合体不仅要解决就业问题, 更要借助高质量的教育供给, 为市域内的青年群体提供向上流动和社会参与的渠道。此类逻辑的存在为联合体提供了伦理支柱, 确保了产教融合在追求产业产出的同时, 不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价值理性要求在产教互动的过程中注入公共福祉的内涵, 使得联合体不仅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中转站, 更是一个培养社会合格公民的文化场域。

2.3. 逻辑多元性与混合性：双重理性的中观场域特征

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双重理性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切分，而是多重制度逻辑在中观场域中的压缩表达。市域作为连接国家宏观政策与学校微观实践的枢纽，具备较完整的治理生态。在这一生态中，政府代表国家逻辑与公共治理逻辑，企业更多体现市场逻辑，职业院校与教师群体承载专业逻辑，而行业协会、学生家长及地方社区则体现社群逻辑。上述逻辑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通过项目合作、标准制定、资源配置与声誉评价等环节形成混合运行。例如，企业参与专业建设并不只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会受到地方责任、行业声誉与长期技能供给预期的约束；院校在坚守育人目标时，同样需要回应绩效考核、就业质量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现实压力。

这种逻辑混合性意味着，联合体的治理成败不仅取决于逻辑是否共存，更取决于不同逻辑以何种权力关系被组织起来[7]。谁掌握财政资源、政策入口、标准制定权和数据解释权，谁就更可能将自身逻辑转化为联合体的主导议程。因而，市域产教联合体并非单一维度的行政指令产物，而是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多元逻辑在特定权力结构下相互调适的制度表达。如果抽离工具理性，联合体将失去现实的生存土壤，无法获得产业界的资源支持；如果抽离价值理性，联合体则可能沦为片面服务单一产业利益的附属平台；如果忽视国家、专业与社群逻辑之间的混合机制，则难以解释其何以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形态。理解上述复合属性，是深入探讨其后续逻辑冲突与治理路径的前提。

3. 双重理性张力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逻辑冲突

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逻辑冲突，并不只是企业与院校在目标函数上的不一致，而是多重制度逻辑在有限资源与有限议程中的竞争性排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只是这种制度复杂性的集中表现，其背后还伴随着国家逻辑、专业逻辑与社群逻辑对资源配置优先权、人才培养周期以及制度正当性的不同要求。当不同属性的组织被迫在同一个场域内进行深度协作时，掌握政策接口、资金渠道、技术标准与评价话语的主体往往更容易将自身偏好嵌入正式规则之中。这种权力差异使逻辑冲突不再是均衡博弈，而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8]。

3.1. 目标取向的异质性与评价准则的错位

目标导向的异质性直接引发了评价准则的严重错位。工具理性主导的企业侧通常将产教融合视为降低人力资源获取成本与技术研发成本的手段[9]。其评价指标往往围绕生产效率、岗位胜任度以及短期技术回报率展开。在该逻辑下，企业更倾向于针对特定岗位的操作技能进行强化训练，要求教学内容高度窄化以适配当前生产线的即时需求。然而，价值理性主导的院校侧则需遵循职业教育的公共属性[10]，将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流动性以及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视为核心产出。院校坚持学科体系的相对完整，强调通用素质与理论基础，旨在为学生提供应对未来产业变革的适应力。当双方在课程设置、实训内容以及人才评价上无法达成共识时，联合体往往会走向形式化。表现为企业参与动力不足或院校育人功能被动异化。这种评价标准的断裂，使得产教双方在互动中始终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育人合力。

3.2. 时间维度的非对称性与协作周期的冲突

时间维度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加剧了产教双方的协作摩擦。市场逻辑下的工具理性具有强烈的即时性特征。面对全球化竞争与技术迭代的压力，企业必须根据市场信号迅速调整生产要素，这要求人才培养具备极高的响应速度。这种快逻辑要求联合体能够随时提供符合最新工艺标准的技能人才。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引导的教育逻辑具有典型的时滞性与长周期性。一名技能人才的养成需要经历认知构建、技能

磨练与职业认同内化的过程。这种慢逻辑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量。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具体运作中，时间逻辑的冲突体现在合作协议的短期性与专业建设长期性的矛盾。企业因无法获得即时的技术分红而倾向于短期用工补偿，而院校则因追逐即时的产业热点而导致专业结构频繁变动。此类错位不仅损害了教育教学的稳定性，也埋下了技能结构老化与学生发展后劲不足的隐患。

3.3. 行政科层逻辑与跨界治理需求的断层

行政科层逻辑与跨界治理需求之间的断层，是逻辑冲突在管理层面的具体体现。市域产教联合体要求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政校企的深度协同。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依然遵循各自的行政逻辑。教育部门关注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工信及发改部门则侧重于产业产值与项目落地。由于缺乏统一的利益调节机制与权力运行规程，不同行政逻辑在市域场域内往往产生重叠或互抵[11]。更为关键的是，头部企业、牵头院校或掌握审批接口的政府部门往往凭借资金、信息和制度解释权，在议程设置、项目遴选与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使其他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基层教师与学生群体的诉求更易被边缘化。部门间的权责不清与主体间的权力失衡叠加，导致联合体在处理重大利益分配或资源共享时，极易陷入少数主体主导、多数主体被动响应的治理僵局。

3.4. 组织文化与身份认知的深层心理隔阂

组织文化与身份认知的差异则在深层心理层面固化了理性冲突。在工具理性主导的企业文化中，个体往往被视为具有增值潜力的人力资本，其核心价值在于对生产效率的产出。而在承载价值理性的校园文化中，学生是被教育和引导的社会成员，其主体性与尊严受到保护。当这两种文化在联合体的混合空间碰撞时，往往产生身份认同的撕裂。与此同时，学生、家长与地方社区所代表的社群逻辑，通常更强调公平机会、成长体验与社会流动，这与企业强调即时产出、院校强调规范育人的逻辑并不完全重合。企业导师可能因缺乏教育情怀而将学生视为单纯的生产力工具，而院校教师则可能因缺乏产业敏感度而导致教学脱离实际。这种文化维度的隔阂使得联合体各方在互动中难以建立深层次的信任。由于缺乏共同的意义框架，各主体在面对冲突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策略，优先保护自身组织的逻辑纯洁性[12]。这种深层的文化阻滞，使得市域产教联合体难以从简单的功能堆叠向真正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演进。

上述维度的冲突说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困境并非偶然的技术失误，而是深层逻辑不对等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工具理性提供的动力与价值理性提供的意义，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尚未找到有效的耦合机制。如果不能通过更高层级的制度创新来重新划定两类理性的运行边界，并对议程设置权、资源配置权和评价解释权进行再平衡，联合体将难以摆脱低效运作与价值空转的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市域场域的调节机理，探索如何通过权力结构的重塑与资源配置逻辑的重构，将这种破坏性的逻辑张力转化为推动制度进化的内在力量。只有深入挖掘冲突背后的制度机理，才能为后续的治理路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4. 市域场域对双重理性逻辑冲突的调节机理

在明确了双重理性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后，探讨如何通过场域调适化解这些矛盾，成为理论建构的核心环节。市域产教联合体不仅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具备特定治理能级与资源密度的制度场域[13]。相比于宏观政策的全局性与微观校企协作的偶发性，市域场域提供了调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中观空间。通过分析场域对异质逻辑的调节机理，可以揭示逻辑张力从破坏性冲突转向建设性共生的制度路径。

4.1. 行政权力的统筹作用与利益补偿机理

市域场域内的行政统筹能级为异质理性的利益对价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扮演

着元治理者的角色[14],其核心功能不仅在于通过权力的合法化运作,为工具理性划定合理的运行边界并为价值理性提供物质支撑,还在于通过程序设计纠偏强势主体对议程的过度垄断。市级政府拥有相对完整的财政、土地及人才政策裁量权,这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制度赎买的方式,引导企业履行育人责任。例如,通过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转化为地方性税收优惠、人才引育补贴或金融信贷的优先准入权,政府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利益交换的补偿闭环。与此同时,借助公开议事、轮值协商和第三方评估等制度安排,可以使中小企业、基层教师与学生群体获得更稳定的表达渠道。该机理将企业追求利润的工具性逻辑巧妙地嵌合进社会公共发展的价值框架中,也使权力关系在制度化程序中得到适度平衡。

4.2. 地理临近的信息对称与沟通成本降低

地理临近性产生的信息对称效应显著降低了逻辑调适的交易成本[15]。产教逻辑冲突的一个关键诱因在于双方对彼此底线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严重的代理成本。而在市域这一尺度内,政府、企业与院校之间形成了高频度的互动网络与地理锁定效应。这种临近性不仅便于正式的制度对接,更促进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非正式沟通。场域内隐性知识的流动速度显著加快,使得院校能够更前瞻地感知区域产业链的技术迭代方向,从而调整人才培养的慢逻辑以匹配市场的快逻辑。同时,企业在深度参与市域教育事务的过程中,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教育规律的长周期特征,从而降低因短期利润考核而产生的退出意愿。这种基于地理认知的双向渗透,有效化解了时间维度与目标维度的认知偏差,为双重理性的深度嵌合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资本与信息基础。

4.3. 区域文化的价值整合与认同感重构

区域文化认同在深层价值维度上发挥了逻辑整合的黏合剂作用。市域不仅是一个行政管理系统,更是一个共享特定产业记忆与职业伦理的文化共同体[16]。特定的产业历史往往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积淀能够超越单纯的契约理性。在市域场域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推动工匠精神进入公共教育体系以及倡导社会责任进入企业管理,实现价值层面的逻辑同构。当产教协同被视为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与民生福祉的集体行动时,工具理性所追求的产值增长便被赋予了深厚的价值底线。这种基于地域认同的软治理机制,为化解组织间的文化冲突提供了润滑剂,促使各主体在互动中不再仅仅以自身逻辑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向共同体的价值愿景靠拢。文化场域的调节作用,使得市域产教联合体具备了超越一般市场协作的制度韧性。

苏州在这一调节机理上的实践探索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苏州市政府通过构建跨部门的协同决策机制,将产教联合体的成效考核深度嵌入到城市发展的整体评价体系之中,充分发挥了元治理者的行政统筹职能。在具体运作中,苏州利用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地理临近优势,推动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建立物理空间重合的产教融合中心,有效降低了异质逻辑互动的交易成本[17]。尤为关键的是,苏州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利用金融工具对育人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对冲,本质上是利用工具理性的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的目标,达成了逻辑间的利益对价与意义共生。与此同时,苏州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校企合作的法定权益,为价值理性的坚守提供了法律刚性,这为其协同治理路径的实体化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苏州的案例充分证明,当市域治理能够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透明的信息环境与深厚的文化氛围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便可以从冲突转向共生。

深入剖析该调节过程可以发现,市域场域的介入本质上是对双重理性进行了利益重构与意义重构。此类治理调适并不追求消灭逻辑层面的异质性,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并转化冲突的弹性框架。通过空间锁定降低博弈成本,通过行政介入平衡资源对价,通过文化共识强化目标认同。这一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得市域产教联合体跨越了传统的校企零和博弈模式,演化为一个具有自我修复与调适能

力的制度生态系统。相关逻辑机理的研究不仅夯实了产教融合的中观理论基础，也为后续探索更为精准的协同治理路径提供了逻辑支撑。在这一演化路径的指引下，治理的重点不再是简单的要素堆叠，而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异质理性的能量交换与价值对冲。基于上述分析，市域产教联合体双重逻辑冲突与协同治理演化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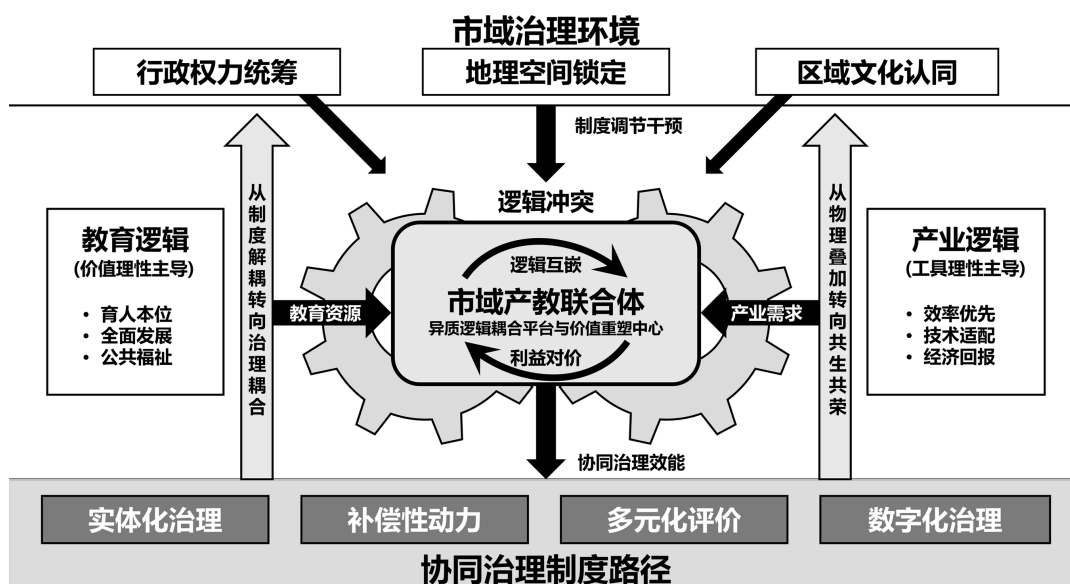


Figure 1.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dual-logic conflict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图 1. 市域产教联合体双重逻辑冲突与协同治理演化机理

该图系统刻画了市域场域内异质逻辑的冲突表征及其协同治理的演化路径。图示中部揭示了基于价值理性的教育逻辑与基于工具理性的产业逻辑在目标函数、时间尺度以及评价准则上的深度张力，这种逻辑对峙以“齿轮磨合”的形式呈现，构成了联合体运行的内源性障碍。位于顶层的市域治理环境发挥元治理职能，通过行政统筹与利益对价为异质理性的共生提供调节场域。作为核心枢纽的产教联合体嵌套于冲突中心，通过逻辑互嵌与意义重塑，驱动资源要素实现高效循环。在底层实体化治理、多元化评价等制度路径的持续支撑下，产教关系跨越了简单的物理叠加阶段，向逻辑耦合与生态共荣的深度融合阶段演进，最终构建起适应区域产业升级的治理闭环。

5. 市域产教联合体协同治理的制度路径

协同治理路径的重构并非简单的行政指令下达，而是一场涉及权力配置、资源流转与评价范式转型的系统性实验。在市域这一特定的制度空间内，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逻辑耦合，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实体化、动力机制的补偿化以及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构建起一个能够自我调节且具备演进能力的治理闭环。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协作困境，更是为了从根本上塑造一种适应现代产业变革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新型制度安排。

5.1. 实体化与章程化的治理结构重塑

完善实体化与章程化治理结构是提升联合体运行效能的制度逻辑起点[18]。目前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在组织形态上往往表现为松散的战略联盟，缺乏独立的法人地位与实质性的资源调度权，这导致治理权力在跨界互动中极易发生消解。应当推动建立由市级政府统筹的理事会治理模式，并设立常态化运行的

专业秘书处以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在具体实现上,可形成三类递进式方案:一是由地方立法或专项授权探索具有特别法人属性的联合体运营平台,其优势在于公共性较强、便于整合多部门资源,局限在于设立门槛高、复制成本大;二是依托现有事业单位或国有平台公司承接秘书处与资产运营功能,其优势在于启动快、政策衔接顺,但需防止行政附着过强;三是由龙头企业、院校和行业组织共同出资设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或混合型运营平台,其优势在于市场响应较快,但必须通过章程锁定育人底线与公益目标。不同地区可根据治理基础、财政能力和产业成熟度选择相应形态,但无论采取何种实体形式,都应以章程明确重大事项表决机制、利益冲突回避规则与退出机制。

5.2. 利益补偿与动力诱导的机制创新

重构利益补偿与动力诱导机制是破解校热企冷僵局的核心抓手[19]。产教融合中的逻辑排斥往往源于企业参与育人的工具性成本与价值性收益在制度层面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资源杠杆的调节功能,建立一套多元化的利益对价体系,将企业的育人贡献与地方性的财税抵扣、金融信贷支持、土地优先供应以及重大项目申报深度挂钩,实质性降低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制度交易成本。在操作层面,可设置基础补偿叠加绩效补偿的组合公式:企业年度补偿额 $S=B+P$ 。其中 $B=b_1N+b_2H+b_3E$, N 为接收实习学生数, H 为企业导师指导学时, E 为实训设备开放折算值, b_1 表示单个实习生岗位的基础补偿标准, b_2 表示每学时企业导师指导补偿标准, b_3 表示设备开放所对应的折旧、耗材与能耗折算系数。而 $P=kR$,其中 R 为第三方评价结果(0~100分), k 为绩效奖励系数,用于将评价结果折算为财政补偿强度。对于税收抵免,可按 $T=\min\{\alpha C+\beta D+\gamma I,L\}$ 进行测算,其中 C 为符合条件的育人投入, D 为参与协同研发与课程开发支出, I 为吸纳毕业生稳定就业的增量成本, L 为地方税种可抵免上限, α 、 β 、 γ 分别表示上述三类支出的抵免权重,可由地方政府依据产业导向、财政承受能力和联合体年度绩效目标实行分档设定。通过将补偿标准、系数口径、核验口径与兑付周期制度化,才能真正降低企业参与的不确定性成本。

5.3. 多元价值维度的评价与反馈体系重构

建立多元价值维度的评价与反馈体系是引导联合体良性发展的逻辑转向。现行的评价范式往往过度锚定于短期的经济效益或单一的毕业生就业率,难以有效测度职业教育对人的长远成长以及对产业韧性提升的真实贡献。协同治理要求建立一种平衡产业效能与教育本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可按过程、结果、短期、长期四个维度构建指标:过程性短期指标包括企业课程开发参与度、实训岗位兑现率、双师协同授课学时;过程性长期指标包括共建专业稳定度、设备共享频次、联合研发持续年限;结果性短期指标包括岗位匹配率、学生职业资格获取率、技术改进项目数;结果性长期指标包括毕业三年留岗率、岗位晋升率、技术迁移能力评价以及对本地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撑贡献。政府可据此设置年度监测、两年滚动评估与三至五年追踪评估三级反馈链条,并引入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交叉核验。上述评价范式的转向不仅能够为政府的财政投入提供精准的数据画像,更能在深层认同上强化联合体的价值共识。

5.4. 数字化平台的精准治理与技术支撑

推动产教资源数字化平台建设是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技术支撑体系。市域场域内的逻辑冲突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被人为放大,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与浪费。通过构建覆盖全市域、跨行业、跨层级的产教融合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产业技术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的实时精准映射。数字化平台不仅能够动态发布人才短缺预警与技术攻关清单,还能对联合体内部的资金流向、设备共享率、学生实训质量以及专利产出进行全流程的留痕监控。技术赋能能够显著降低不同主体间的沟通成本,提高制度响应的灵

敏度。算法驱动的供需对接可以有效过滤无效的行政干预,使工具理性在更加透明与公平的规则下运行,同时也为价值理性的落地提供了可追溯、可量化的证据支撑。数字化手段的引入使市域产教联合体从传统的经验治理向现代的算法治理转型,极大提升了制度运行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协同治理的路径重塑本质上是在不改变各组织核心使命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规则的创新实现异质理性的相容与能量转化。它要求政府由行政命令的单一发布者转向治理规则的精心制定者,要求企业由单纯的劳动力索取者转向人才规格的共同定义者,要求院校由封闭的办学主体转向融入区域创新生态的开放系统。只有通过这种深层次的制度性重组,市域产教联合体才能真正跨越浅层次的业务合作,成为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与促进劳动者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稳固制度载体。治理路径的系统探索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样板,对于破解产教融合瓶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6. 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协同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扩张干预边界。如果地方政府以短期政绩为导向,将联合体简单视为招商引资、项目包装或统计考核的工具,便可能以行政命令替代平等协商,挤压企业与院校根据专业规律开展自主合作的空间。过强的政府主导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组织动员效率,但也可能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并使联合体重新滑入政策热但机制冷的路径依赖。因而,元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包办一切,而在于通过规则供给、底线监管与纠偏机制维持场域秩序。

同样,数字化平台也并非天然中立的治理工具。若平台建设过度依赖单一技术供应商或单一数据口径,可能形成新的数据垄断与算法偏见,使中小企业、薄弱院校以及数字能力不足的学生群体处于更不利的位置。特别是在以数据留痕替代实质治理的情形下,平台容易演化为新的监管加码工具,带来数字鸿沟、隐私泄露与指标异化等问题。因此,数字治理必须同步建立数据分级授权、算法解释、人工复核与弱势主体兜底机制。

此外,多元评价与利益补偿机制若设计不当,也可能诱发新的形式主义风险。一旦各主体过度围绕补贴额度、指标得分与项目排名展开博弈,联合体可能出现为评价而合作、为补贴而育人的象征性合规。特别是在评价指标数量过多、核验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基层学校和企业容易把精力耗费在材料填报而非真实协同上。由此可见,协同治理的有效实施仍以合理的权力边界、适度的技术介入和简明可执行的制度设计为前提。

7. 结语

在识别实施边界与潜在风险的前提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制度层面的生成与演进,本质上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逻辑在区域空间内的深度重构[20]。通过对双重理性的逻辑内涵及其冲突机理的系统剖析可以发现,联合体并不只是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由工具效率与育人价值共同驱动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理性的双重性及其混合形态决定了联合体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异质逻辑的碰撞与磨合,而这种张力恰恰是推动制度创新与治理优化的内在动力。

从制度演进的长远视角观察,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同体属性并非自然生成的产物,而是依赖于市域场域内多元主体的协同建构与利益重组。工具理性的存在确保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通过精准的岗位对接与技术服务,为联合体赢得了生存的合法性与物质基础。价值理性的坚守则为联合体确立了教育的本位与伦理边界,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关注,防止了产教融合走向纯粹的功利主义。两者的动态平衡构成了联合体能够持续运行的逻辑基石。

未来的治理实践应当更加关注市域层级的制度供给与场域调控功能。市域作为中观治理单元，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行政权力的合理介入与资源配置逻辑的重构，为双重理性的共生提供必要的制度闭环。这要求政府由传统的指令管理转向现代的元治理模式，通过实体化治理结构的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重塑以及评价导向的转换，将破坏性的逻辑冲突转化为建设性的协同力量。治理路径的探索不仅能够提升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更能够推动职业教育从传统的功能型合作向现代的治理共同体转型。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成功建设将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本土样板。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超越对单一工具效能的盲目追求，在更广阔的市域场域内探寻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耦合点。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联合体本质属性的理论认知，也为破解长期以来产教融合校企冷与价值脱节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通过不断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必将成为支撑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与促进学生可持续成长的稳固制度平台。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长沙市社科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长沙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25CSSKKT62, 主持人: 黄振);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人工智能背景下湖南装备制造企业经营效率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9YBG011, 主持人: 黄振)。2025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湖南装备制造产业链韧性仿真分析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5C1013, 主持人: 黄振);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职业教育市域产教联合体耦合发展测度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4YJA880017, 主持人: 胡敏)。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304/t20230421_1056642.html, 2023-04-20.
- [2] Friedland, R. (1991)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Powell, W.W. and DiMaggio, P.J.,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2-263.
- [3] Thornton, P.H., Ocasio, W. and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01936.001.0001>
- [4] 刘奉越. 高质量发展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逻辑及路径[J]. 教育学术月刊, 2024(1): 9-15.
- [5] 陈良. 从外源到内生: 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进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实现路径[J]. 成人教育, 2025, 45(10): 63-69.
- [6]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eacon Press.
- [7] 李胜, 刘晓. 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学科建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10): 100-108.
- [8] Greenwood, R., Raynard, M., Kodeih, F., Micelotta, E.R. and Lounsbury, M. (2011)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5, 317-371. <https://doi.org/10.5465/19416520.2011.590299>
- [9] 刘奉越, 于莎.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制度逻辑及优化路径[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4(2): 84-89.
- [10] 徐林, 王阿舒. 技能型社会高职思政教育的逻辑、审思与路径[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 43(7): 67-76.
- [11] 叶怀凡. 应用型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及调适——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 2024(4): 43-50.
- [12] 谭赞武, 许孔联, 聂艳平, 等. 场域理论视域下高职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跨界困境与共生路径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22): 84-90.
- [13] 孙翠香, 王彦斌. 基于“结构洞”理论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 问题及优化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19): 44-53.
- [14] 曹靖, 潘有娟, 尚嘉珉.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产教融合型企业可持续建设治理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5(20): 40-48.
- [15] 余怒涛, 李奕蓉, 张华玉. 客户稳定性与企业战略选择[J]. 财务研究, 2025(4): 52-68.
- [16] 肖鹏, 李怀恩. 公共文化共同体: 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12): 116-121.

-
- [17] 赵晶晶, 钱净净. 聚集经济理论视域下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与发展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 49-56.
- [18] 赵斯文. 协同论视域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实践困局及优化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35): 76-80.
- [19] 李梦卿, 陈姝伊. 职业教育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方向与路径[J]. 职教论坛, 2023, 39(10): 24-30.
- [20] 庞功军, 黄巨臣, 袁维新. 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何以如此之难——基于“组织-环境-技术”框架的分析[J]. 职教论坛, 2025, 41(12): 5-12.